

中西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的对比研究： 从“斯诺登事件”的伦理纷争说起

胡华涛

摘要

新闻传播活动的多元事实与价值理性常使得新闻伦理推论模式陷入困境之中，其原因在于新闻伦理推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休谟所提出的如何说明从新闻的“是”跃迁到“应该”的理由问题，无论是最终结果的、义务论的、社会契约的，个人化的，还是综合的情景回溯新闻伦理推论模式都无不在求解此问题，只是其理据来源或者思维方法不同而已，但其普适性却只能从“事实如何”出发，且应建立在“事实是这样”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

新闻伦理、推论模式、斯诺登事件

作者简介

胡华涛，博士，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广东湛江，524048），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电邮：ihht@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日常新闻推理与论证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860011）阶段性成果。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ews' Ethical Reasoning Models: "Snowden Incident" as A Case Study

HU Huatao

Abstract

Due to multiple facts and value rationalit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t's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the ethical reasoning model of news.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ethical reasoning of news is in fact the question that Hume once proposed "how to explain the transition from 'is' to 'shoul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models, final



result, rule, social contract, or personalized, they invariably try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eir differences lie in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ways of thinking. In short, pondering on the ethical reasoning model of news should start from “what the fact i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is the truth”.

Keywords

news ethics, reasoning model, Snowden incident

Author

Hu Huata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Humanities School,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oretical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mail: ihhtihht@sina.cn.

This paper is subsidized by the Youth Fund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on the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Model of Daily New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Project Number: 13YJC860011).

美国“棱镜门”事件的影响仍然持续，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的行为是叛国还是爱国？是英雄的还是犯罪？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些新闻伦理命题几乎在全世界媒体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诚然，新闻传播活动不仅仅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胡华涛,2011)。前者关乎新闻的真实性，后者直指新闻伦理的核心。这个问题我们也可大致规约为新闻伦理中的“休谟问题”。所谓“休谟问题”，是指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在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注意到以往许多哲学家经常将“是什么”用作为“应该是什么”的论据却没有解释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分别。这个有关价值判断不可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构成了后世、特别是20世纪道德分析哲学讨论的一个主题。对于新闻伦理而言，著名的休谟问题也可解读为从新闻事实的陈述中能否或者如何推出新闻（伦理）价值的陈述。表面看这是个新闻逻辑问题，其实质却是个新闻伦理实践问题，事关新闻应当如何行动（采访、报道、解读）之根据。

对于“棱镜门”事件来说，关于新闻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几乎没有纷争，而有关新闻伦理的定性及其价值归因分歧较为尖锐，为何？因为新闻报道中的任何伦理推论模式顷刻也离不开现实伦理环境的制约，它要受到由说（写）者、听（读）者、现实背景、人文等诸因素所构成的传播环

境的适时制约。因此,伦理信念或者态度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总是因人、因地、因时而权变。综观国际国内关于“斯诺登泄密事件”报道所引发的种种伦理分歧,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这些分歧的一些核心之处及其背后所依据的几个伦理标准:

(一)报道是否以预期的结果作为新闻伦理决策的依据,或者以社会大众所能得到的最大回报作为新闻报道伦理决策的底线。

(二)报道是否以新闻事件的某种绝对意愿之下的义务规则为基础做出新闻伦理判断和推论的。

(三)报道是否以某一国家或者组织之间的契约价值观为基础做出新闻伦理推论与决策的。

(四)报道是否以个人的信念为基础做出新闻伦理论证的。

(五)报道是否以新闻情境权变之下的多元伦理融合为基础建构的论证体系。

以上每一种判断原则我们姑且视为都反映了一个新闻伦理归因的根本不同的方法或者模式。第一种判断认为,斯诺登泄密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新闻传播结果的赞成或者反对的评价观点。可称之为最终结果的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第二种方法,斯诺登泄密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某种社会义务标准。可称为义务论的新闻伦理推论模式;在第三种判断中,斯诺登泄密行为的正确性是建立在某一特定社会或团体的习俗和规范基础之上的,就称之为社会契约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第四种判断中,斯诺登泄密行为的正确性是建立在个人良心和道德标准基础之上的,暂且称之为个人新闻伦理推论模式;最后一种是综合的、情境的、多元新闻伦理推论模式。不难想象,正是这几种新闻伦理推论方式的理论来源、主要观点和主要关注问题的权重不同形成了“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新闻伦理的现实分歧,如下所述。

一、最终结果的新闻伦理推论模式

一般而言,功利主义是最终结果的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的理论基础。它是由英国伦理学家边沁和密尔提出一套道德价值判断系统。该理论认为特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应该以其产生的结果为基础进行判断,使美德最大化的方法就是要使最大数量的人们获得最好结果的最大化。这些观点认为在为



个人、组织甚至社会取得最大利益的服务中,打破规则或者违反常规是可以接受的(边沁,2000:11; Mill,1962:148)。正如《北京青年报》7月4日在《斯诺登事件“万花镜”》的末尾评论那样:“即便违法,斯诺登以掀开情报机构密盖子的方式,张扬了普通公民维护基本权利,……在国与民的权力平衡中,他的作用有很强的正面性。”无独有偶,《纽约时报》中文网7月1日发表评论称“假如奥巴马政府为国家安全而做的事情牺牲了美国人本应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有一个告密者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中西方媒体都肯定了人类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追求整个社会的幸福是道德的最高理想这一共同伦理原则。同时,不难发现后果主义伦理推论模式从“是”向“应该”思想跃迁的逻辑就是用自然(事实)的属性去规定或说明道德(或价值),而且认为这种属性可以被经验地加以观察,如“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是对的/错误的”,就可还原为“斯诺登的泄密行为与整个人类和家庭及所处文化所奉行的行为理想是相契合的/相抵触的”这样一个原则上可证实的事实判断。尽管如此,同是功利主义主导的中西媒体在斯诺登事件也表现出了诸多伦理态度和信念上的差异。

(一) 行为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的博弈

中方媒体总体以行为功利主义的“幸福(利益)最大化”为依归来决策报道,如11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监听门”少扯“反恐”当遮羞布》和11月9日《人民日报》《互联网之父指责美国网络监听行为》等,这些报道指出像正义、自由和守诺等道德规则对于美国而言只是权宜的和次要的,一旦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会减少美国的总体幸福时,便有理由违反之。美国媒体的辩护则多从规则功利主义出发,如6月15日关于《华盛顿邮报》“斯诺登是英雄?大错特错!”以及《洛杉矶时报》“不应调查斯诺登,而应询问政府官员”的报道所评估的不是特定行为的结果,而是它从功利的角度评估像守诺、讲实话和正义原则等普遍规则遭到破坏会有可能带来局部的暂时的快乐,但之所以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是因为遵守这些规则会在总体上促进人们的社会福利。

(二) 共同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争论

由于奥巴马政府的辩护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即大多数的利益而实施的棱镜计划。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定义“社会取得最大利益”的悖论。凤凰卫视对此评论道,这里涉及共同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争论。共同体主义不期

待世界主义的普遍道德为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提供道义的外援。而世界主义则相信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道德的存在——地方正义之外，全球正义更符合人类道义上的福祉。如果承认共同体正义的价值，那么，斯诺登的行为背叛了他对共同体的承诺，与他达成协议的共同体有理由宣告他的背叛是不正义的，但看起来不幸的是，斯诺登似乎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相信全球范围内，总会存在同情他的普遍道德和全球正义(彭晓芸,2013)。

(三) 动机符合道义与片面效果论的不同

我国媒体秉承传统功利主义思想而特别强调美国监听行为的动机不符合道义，主张如果你的动机不纯正，即使结果是正确的，你的行为也不符合道义。西方媒体功利主义者则主张片面效果论，强调监听行为的安全效果，主张为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最后，中西媒体还有一些关于最终结果论证的焦点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受众如何（以及由那些人）定义由斯诺登泄密事件所带来的最大效应以及如何衡量的问题。

2.如何看待泄密事件的短期结果和长期结果的正能量问题。

3.如果斯诺登泄密事件不能为每一个人带来效用或者获益，那么它为大多数人制造效用或者利益妥当吗？即使其他人或者集体、组织不会获益或可能遭受损失时。

这些问题应该说仍在讨论之中，尚无定论。尽管如此，功利主义感兴趣的只是包含最大福利的事态，而不关心这种事态是由谁造成，也不关心是如何造成的，因此，可以肯定，由它构建的模式必然包含所谓的消极责任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义务论的新闻伦理推论模式

非后果论的道德推理也称义务论的道德推理。它由许多基于原因而不是基于后果的准则组成，认为决定特定行为是否道德与该行为的后果无关，这种观点的最大支持者是康德。在康德看来，道德是由约束任何理性存在的责任或义务所组成的，这种责任或义务的共同理念是“善良意志”的体现(康德,2002:16)。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是唯动机论的，即一个行为是否善良，是否符合道德，不是看一个行为的后果，而是看一个行为是否

出自于善良意志,善良意志之所以善良,并不是在于它所发出的任何行为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好的效果,而在于它被意志认为是善良的。如11月1日北京日报《美式“神逻辑”何时休》评论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打着维护‘世界和平’旗号,称搞监听是为了反恐需要,那么,难道在这位世界警察眼中,包括默克尔在内这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成了‘恐怖分子’?……透露出的美式‘神逻辑’更是雷动众生”。这里的“神逻辑”指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所谓“善良意志”,按康德的推导结构可示如下:

(一) 美国必须遵循那种美国意愿它能成为普遍准则的原则来行动(绝对道德规则)

(二) 美国不愿意不监听盟友而使世界和平遭到破坏或者使世界遭到恐怖袭击,所以不监听盟友而使世界和平遭到破坏或使世界遭到恐怖袭击不能成为普遍准则(道德行为准则)

(三) 所以,美国应该遵循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旗号和“反恐”需要而监听盟友的准则(道德推理结论)

持直觉主义伦理学的摩尔把此种观点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并认为康德伦理学的谬误是用某种形而上的,超验的判断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诸如此类的道德命令在“斯诺登事件”报道中还着实不少,如11月9日成都商报发文说“克林顿回应斯诺登事件:要安全又要隐私不可能”,这无异于奥巴马的辩辞“该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它们无疑都是康德式的道德律令。

与康德超验的、纯粹的准则不同,罗斯把义务看作多元性的、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在不同的义务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坚持“显见的义务”,而“显见的义务”就是在特定伦理情景里显现的义务,在某种特定环境或情景下的“显见的义务”高于其他义务,是必须遵守的。“显见的义务”包括:诚信的义务、补偿的义务、感恩的义务、公正的义务、仁慈的义务、自我提高的义务、不作恶的义务(Ross,2002:20-21)。诚如《今日美国》的评论《斯诺登是罪犯》所言:个人没有自行决定何为秘密文件的权利。如果个人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有意地把机密文件交给他人的话,这就违反了诚信原则和法律……(虎嗅网,2013)。可见,按照“显见的义务”的逻辑推论原则,斯诺登违背了诚实和守信原则,因为他曾经做过明确的和无保留的誓言要尊重他被授信的信息的隐秘性;他背



叛了自己的朋友。他还背叛了自己的雇主。他背逆了开放政府的目标。最后,他也背叛了宪法。

总体上,中方媒体批驳了各种美国制造的康德式道德律令,而美国媒体却不断制造一些所谓的命令和显见义务以此作为狡辩的理据。反对者也不禁诘问到:什么是规则?谁制定了规则?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伦理规则存在吗?当政府制定的政策、开展的工作、内部的规定等等是不符合宪法的,不合乎公共道德的时候,我们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规则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吗?当好规则产生不出好的结果时又会发生什么事呢?由此可见,斯诺登面临的就是这样两个两难的道德处境:一方面,他掌握着一个他认为会有真实威胁的项目信息。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公务员,一个组织的成员、国家的公民,曾经做过特定承诺。有些时候,泄密者不得不泄密。他们掌握的信息如此的重大,以致他们违背承诺显得正当。

三、社会契约式新闻伦理推论模式

社会契约伦理者认为行为的正确性由团体的习俗和规范决定,这个观点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的基本著作中形成了最好的体系。其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以“公意”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的道德力量论述了公意来源于人们联合的共同需要。公意的确立就是人们把联合的共同意愿以缔约的方式体现出来。公意以人民主权的形式体现并建立起了道德共同体。在道德共同体中法律是对公意最高地位的确认事实上就是在为道德立法。公意的继续是要使公意转化为相应的权利从而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也就继续了公意这种道德力量的神圣性(黄璇,任剑涛,2009)。就美国政府与监听权的合法性而言,纽约客杂志辩称称:“就威瑞森公司对通讯的监听记录(被披露的监听项目)而言,这些都是合法而权威的政府项目,……。他所揭露的并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而只是有违他个人道义标准的東西。问题就是,如果政府雇员(和承包商)仅凭个人喜恶就来肆意破坏政府项目的话,这个国家是否还能正常运转呢?”其实,这就是说棱镜监听计划本是政府、公民之间的一个法律授权的契约项目,斯诺登必须遵守。这个“公意”的建立和维持基础是9·11之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系列强大的监控权力,如恐怖袭击之后立刻获得通过的《爱国者法案》

(Patriot Act), 就开始赋予了美国政府监听公众电话的广泛权力。据《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报道, 以反恐的名义, 美国允许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联邦调查局(FBI)搜集各种数据, 这项秘密计划始于布什政府时代, 代号为“棱镜”(Prism), 始于2007年。然而, 事后在美国安全局对民众电话和网络通讯监听本身的民意调查中, 民众的立场却两级分化, 48%的民众支持政府的这种行为, 47%的民众不支持政府这么干。在有关监听项目是否有助于反恐的问题上, 53%的美国人认为有助于反恐, 41%的美国人认为无助于反恐。关于美国安全局对民众电话和网络通讯监听涉及到民众的隐私权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不分男女、党派和年龄 多数人的认知和感受是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63%的美国人认为监听项目将侵犯个人隐私权。

据此, 中方媒体如6月4日《中国青年报》《“棱镜门”大数据时代的公民与政府》、7月1日《解放日报》《斯诺登说了真话》、11月4日《人民日报》《监听丑闻让美政府“四面楚歌”》等分别指出: 从社会契约伦理精神的角度来看,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性选择和一种根本性的交往规范, 社会契约都包含着一系列的伦理意蕴。简言之, 契约伦理道德是指包括经济政治契约、法律契约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契约论中一种基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价值尺度的具体体现, 包括自由与平等、自愿与合意(合意构成了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基础)、合作与互利等原则精神。而“棱镜事件”之所以会受到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全世界媒体的谴责, 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破坏了这种最基本的自由与平等、自愿与合意、合作与互利的契约伦理道德。如此意义上看, 在现代社会, 只有我们正确断定普遍意愿以及共同利益, 契约才可成为衡量道德与不道德、正义与不正义的标准。

四、个人化新闻伦理推论模式

个人伦理标准是人们只应该询问自己的善恶观念, 而不试图以结果或者规则, 或者团体的社会规范为基础来决定什么是伦理。如果把斯诺登比作一位正在室外泳池长椅上全神贯注地读着体育新闻的父亲。他突然听到女儿的呼救, 原来女儿不慎走到了深水区, 正在水面挣扎。请问在特定时刻, 特定环境(只有父女两人在场)之下, 这位父亲做些什么才是正确的



呢?他会使用什么样的伦理体系呢?如果他选择最终结果伦理,他会将毁坏公用设施,弄脏自己的衣服、手表以及皮夹子与挽救他女儿的性命做一番功效比较;如果他选择了义务规则伦理,他会首先查看一下旅店是否贴出任何规则,禁止穿着整齐的人进入游泳池;如果他选择的是社会契约伦理,他会思考一下他与其他家庭成员所共有的社会契约的合意性。显然,他不会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会立即跳进泳池去救他的女儿。个人伦理主义者认为,这位父亲采取行动的动机是他内心在呐喊“立即行动”。因为人类的本性(理性)使个体发展了个人判断是非的能力,一种判断什么是对的以及应该如何去做的内心感觉。最终这些规则留在个体和个人心中,尽管这些规则会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诚如《赫芬顿邮报》撰稿人所罗门(Norman Solomon)在文章中指出,政府和政府承包商可以买来斯诺登所掌握的技术,却没能买到他的言听计从。和维基泄密主角之一曼宁一样,斯诺登遵从自己的原则,其行事标准超越了“一切遵守命令”的社会规范;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有名的记者不顾宪法第四修正案、与政府言行保持高度一致的做法则显得非常懦弱。

这种模式其实也可称之为个人情景功利主义行为模式,1972年波特在《道德论证的逻辑》中就论证了人们在道德困境中的行为决策的道德推理逻辑,并提出了一个SAD(situation—analysis—decision)的行为伦理决定模式,即在人们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中,道德推理包括了三个基本环节:(一)情境定义;(二)情景分析,包括道德理论的应用;(三)决定或伦理判断(Potter,1999:87)。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决策常常是与实际行为决策相伴而行的。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有些媒体所采取的社会直觉主义道德立场,如纽约客杂志所言斯诺登是个该被关到监狱的傲慢的自恋狂就是个案之一。社会直觉道德判断理论认为,道德直觉是有内在联系的道德概念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自动输出(Haidt,2001)。可见,这种理论较少考虑道德发展依赖于个体成熟及文化塑造社会因素。尽管如此,个人化模式也不同于中方有些报纸所采取的基于行动者立场(动机)道德推理模式,后者太过于看重心理动机的道德决定作用,如11月6日《中国青年报》《看待“监听丑闻”切莫太天真》一文把监听丑闻归因为以名利为基本道德动机的道德游戏行为,也未免太主观臆断了,以至于有些像不顾道德事实的神侃和合理想象了。

个人伦理主义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并以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判断什么是对的,因为人是理性的人。斯诺登自称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自己“只是一个美国人”。想必斯诺登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放弃20万美元的年薪、违背进入美国国安机密界的誓言,说出了“良知不容美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这种无畏精神使他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网路人权斗士。据美国媒体分析,2010年前后斯诺登就已经开始思考他暗中参与的网络监控活动的道德性。他自己说,曝光“棱镜”项目的唯一目的是告知公众:政府以人民的名义干什么事情,而所做的正是针对人民。由此可见,斯诺登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本身人性光芒照射的结果,但这也必然会招致“这样做只能似乎是正确的”责难。

五、情景回溯多元伦理推论模式

以上四种新闻伦理推论模式都是由简单且逻辑同向的规则建构的道德推论体系。然而面对像斯诺登事件这样复杂新闻情境,上面任何一种道德推论模式往往捉襟见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再多的规则也不足以应付道德生活的复杂性。社会生活和实践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往往让已有的道德规则无所适从,同时多种规则相冲突的道德困境常常也是一个让人困惑和棘手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认识一下(新闻)伦理推理的基本结构、内容和逻辑表达形式等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分述如下:

(一) 中西新闻伦理推论结构问题。

在结构上道德推理有个最低要求:至少有一个前提是伦理命题,而且还必须至少有一个前提是有关事态的非伦理命题才能共同推出道德结论。因为根据休谟命题原则,我们既不能从事实判断推出道德判断,反之道德判断也不能单独由事实判断推出。如:人人必须信守承诺(道德原则命题),我约好明天还钱给张三(事实判断),所以,我明天应该还钱给张三(道德推理结论)。但是一种新闻事态或者行为的道德论证是否成立,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支撑并不取决于单一的价值条件和事实条件,而是还要追索到一系列高层次的价值条件和事实条件。因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效果与社会基本伦理原则之间并没有直接逻辑沟通,它们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直觉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联系。因此单一价值和事实条件的设定无法将人们从多种规则相冲突的道德困境中拯救出来。因此,新闻伦理推理论证条件总



是以集合面貌呈现的,可表述如下:

1. 道德准则集 R , $R=\{R_1, R_2, R_3, \dots, R_n\}$
2. 新闻事实陈述集 F , $F=\{F_1, F_2, F_3, \dots, F_n\}$
3. 道德评价或决策 E , $R \cup F \Rightarrow E$

由此可知,新闻伦理推理论证(moral argument)就是给出一个新闻伦理命题以一系列事实和价值理据的集中思维过程。

(二) 新闻伦理推理本质上就是情境推理。

回到“斯诺登事件”几个月以来数以千计的报道文本可知:无论中西新闻伦理推论中都潜藏着一个共同构成要件:除了大前提设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各种道德准则以及小前提所设定的特定新闻事件的道德推理过程之外,情境因素也是伦理推理至关重要的逻辑项。这是因为:

1. 新闻推理本质上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某些情境推理(胡华涛,2012)。因此,新闻伦理推理是一种情境推理不过是题中自有之意。
2. 在新闻伦理推理中,由于道德原则自身不可能有适用于任何新闻情境的统一伦理意义。它们需要新闻情景参与以帮助确定道德原则在具体情境之下的伦理意义以及适用范围和伦理权重。
3. 由于道德原则之间存在交叉的价值冲突空间,在特定伦理冲突中哪一道德原则具有优先权、此原则的哪个方面尤为重要又依不同新闻情景而发生权变。

如此,新闻道德推理就要充分注意情景因素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情境推理与多元规则融通到上述新闻伦理推理论证集之中呢?

(三) 从波特模式到情境回溯项的推出

从“斯诺登事件”媒体反应看,西方传媒主打所谓的波特模式(图1)。因为波特模式第一、二步就是要解决情境推理中的价值选择与判断问题。第三步原则阶段就是解决情境、价值与伦理原则的融合问题,只是整个模式比较机械,是单向的线性逻辑运动的结果。对此先后有一系列改良变种,如杰伊布莱克模式(图2)认为行为的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之间都可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情境、价值和伦理原则之间的融合是非线性的、灵活的,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尽管如此,波特模式及其变种繁琐的、且专业化的伦理分析步骤在传媒伦理实践中适用性无疑会大打折扣。后来



克利斯蒂安等人开放的圆（图3）以及古特与迈什8个步骤模式（图4）也没能解决此问题，限于篇幅，不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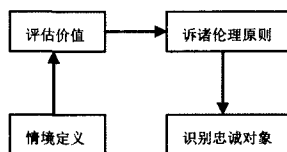


图1 波特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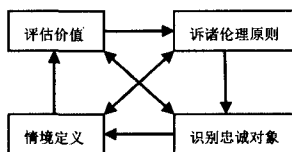


图2 杰伊布莱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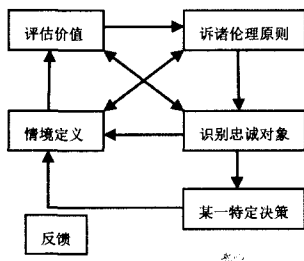


图3 克利斯蒂安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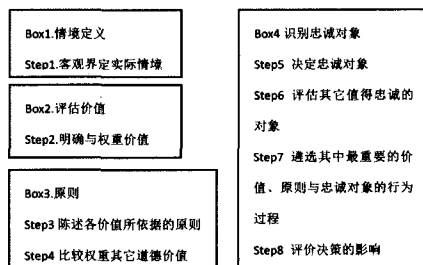


图4 古特与迈什模式

对此，笔者提出，为了更加灵活地处理新闻伦理推理中的情境、价值和伦理原则三者之间的逻辑证成关系，我们就必须在上述新闻道德推理的基本形式中增加一个关乎情境的逻辑项。这个逻辑项可根据新闻情景的变化适时地重新界定和修改作为大前提的道德准则集中某些具体原则的伦理意义、使用范围及其重要程度，以进一步明确它们的有效性和真假值。这本质上是一个按新闻情景对道德准则合理性的反思回溯推理过程，我们不妨称之为新闻情景回溯的逻辑项。于是，新闻情景回溯多元伦理推理形式便可表述如下：

1. 道德准则集 R , $R = \{R_1, R_2, R_3, \dots, R_n\}$
2. 新闻情景陈述集 C , $C = \{C_1, C_2, C_3, \dots, C_n\}$
3. 新闻情景回溯项 CR , $CR = \{CR_1, CR_2, CR_3, \dots, CR_n\}$
4. 道德评价或决策 E , $R \cup C \cup CR \Rightarrow E$

这里 $R_1, R_2, R_3, \dots, R_n$ 为道德准则规划集合。 $C_1, C_2, C_3, \dots, C_n$ 为情景陈述集合。 $CR_1, CR_2, CR_3, \dots, CR_n$ 为从新闻事态的某些具体情景出发对道德准则集合进行反思、重新评估、重新修订的逻辑项。 E 为由(1),(2),(3)推出的道德推理论证的结论，它是被新闻传播者反复权变过的道德

命题或是最新做出的道德判断。这一模式可灵活解决像“斯诺登事件”这种因道德事实的多元性而导致的伦理纷争问题。

（四）如何确定和完善道德准则规划项的“数据库”

在大前提道德准则集的持有和添加上，我们不能像波特模式那样简单地将几个西方传统的诸如亚氏的中庸之道、康德的绝对命令、密尔的功利主义等基本道德原则都纳入其中作简单演绎。笔者以为这除了过于理论化之外，也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大众层面的可操作性。在不排斥所有人类伦理基本精神和原则的指导之外，中西方媒体应该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作为数据库建设的底层，如迄今为止中西都无法超越的四种普适伦理价值：功利价值、正义价值、仁爱价值与生态价值，因为它们与生存权、幸福权、自由与平等权、仁爱权、环境权等基本人权息息相关。除此，将包括诚实、公正、追求公益和关注需要等现实的媒介伦理基本准则作为优先选项以充实道德准则库。

综上所述，中西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新闻事实的必然性与人类新闻活动的目的性的矛盾统一问题，因为新闻伦理推论的每种范式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和伦理环境的适应性要求。因此，新闻实践界所追求的所谓“伦理共识”在多元化伦理环境之下只能是某种宏大理想，但也不必据此漠视或否认新闻伦理的社会效用。因为新闻伦理推理是生活的“实然”合乎逻辑地对未来种种“可然”生活状态的推测与想象，并根据人类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对种种“可然”生活想象再加以“应该如何”的价值规范，经此它们就会理所当然地产生普适性的道德价值导向效用，这也是新闻伦理的社会效应逻辑。因此，任何新闻伦理推论模式的普适程度不过是对未来生活想象和规范的所达到的理性深度如何而已，但它们始终却只有“事实是这样”一个逻辑起点。

（责任编辑：陆佳怡）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胡华涛(2011). 霍布斯式新闻推理的逻辑、运用及其规制.《国际新闻界》,(5),51-56.
[Hu, Huatao (2011). Logics, uses and regulation in Hobbesian news reason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5), 51-56.]
- 胡华涛(2012). 新闻推理与论证的语用逻辑研究.《国际新闻界》,(2), 58-63.
[Hu, Huatao (2012). Studies on pragma-logic of news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 58-63.]

黄璇,任剑涛(2009). 解读“公意”:道德制高点的面纱——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文本依据.《学术研究》, (8),56-59.

[Huang Xuan & Ren Jiantao (2009). Decoding the ethical meaning of “General Will” based on Rousseau’ s “the Social Contract” . *Academic Research*, (8), 56-59.]

虎嗅网(2013). 关于“棱镜”泄密者斯诺登, 美国主流媒体是这样评价的. 2013年7月10日访问于虎嗅网: <http://www.huxiu.com/article/15917/1.html>.

[Huxiu.com (2013). U.S. mainstream media’ s comments on Snowden, the leaker of “Prism” . Retrieved on July 10, 2013 from <http://www.huxiu.com/article/15917/1.html> .]

彭晓芸(2013). 美国监听风波中的政治伦理困境. 2013年7月1日访问于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wangping/qietingfengbo.shtml>.

[Peng, Xiaoyun (2013). Political ethical dilemma on the United States’ storm of monitoring. Retrieved on July 1, 2013 from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wangping/qietingfengbo.shtml>.]

[英]边沁(2000).《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ntham J.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德]康德(2002).《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Kant, I. (2002). *The principle of moral metaphys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814-834.

Mill, J. S. (1962). Utilitarianism. In Katz, J. et al. (eds.). *Writers on ethic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Potter, R. B. (1999). The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of Potter Box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tate of the World Forum, San Francisco, CA.

Ross, W. D. (2002). *The right and the g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